

PORTUGAL AMORDAÇADO



轭下的葡萄牙

[葡萄牙]马里奥·苏亚雷斯 著

作者简历

马里奥·苏亚雷斯生于1924年，是葡萄牙第一民主共和国部长、教育家若奥·苏亚雷斯先生之子。苏亚雷斯先生曾在里斯本大学和巴黎大学攻读历史、哲学和法律，并获法学博士学位。他年青时，即投身反对萨拉查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为此，曾十二次被捕入狱，并未经审判即被驱逐流放过。他先后参加过几个主张共和及社会主义的组织。苏亚雷斯先生是葡萄牙社会党的缔造者，是该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并连选连任担任此职达十三年之久。他是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多次率该组织代表团出访拉丁美洲、中东、非洲及中国。他曾任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国务部长，第一、第二及第九届宪法政府总理。1986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并于1991年以70%的选票再次当选连任。苏亚雷斯先生在政治、历史及法律研究领域著述颇多。他的著作《轭下的葡萄牙》一书被认为是对葡萄牙半个世纪以来独裁统治的最为详尽的描述。

葡文版前言

现在第一次用葡文出版的这本书写于1971年我在意大利和法国流亡时期,1972年4月卡尔曼——列维出版社经删节后以《LE PORTUGAL BAILLONNÉ》^①的书名在巴黎用法文出版。它基本上是一部民主人士在法西斯年代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的忠实见证录。从1942年那个遥远的年代起,我就开始投身于这场斗争。所以,它不是一部历史著作,更不是对葡萄牙长期以来国情的深入的政治和社会的剖析。它首先是一部自身经历的见闻录,是在流亡时期写下的随感,目的是想对“4·25”之前所有反法西斯战士反对卡埃塔诺独裁的全面斗争作出那怕是微小的贡献。

读者不难发现本书中存在的时代局限性。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在某些方面可能显得有所不足。但是,我还是希望不作任何增删而保持它1972年出版时的原貌。我们记得,即使对一些久经考验的自由战士来说,当时的卡埃塔诺政府也不是一个完全失败的政权。

本书的主要章节,如“一桩罪行的历史”和“殖民冒险”,鉴于后来出现的一些虽未改变我的基本立场,但不失为重要的、新鲜

① LE PORTUGAL BAILLONNÉ(法文):“被堵住嘴的葡萄牙”。

的事件，本可以写得更丰富、更完善一些。然而，这本“具有时间性的书”，尽管当时葡萄牙对它保持绝对沉默，但在国外，尤其在法国却引起了很大反响。我们今天已生活在自由之中，我认为不作任何修改和增删，让葡萄牙人看到当时的原貌是有益的。

从1972年到1974年4月25日凌晨武装部队把葡萄牙归还给葡萄牙人这段期间所发生的事件——为国内和国际良知所谴责的制度缓慢腐烂的过程，美好的憧憬和现在我们已生活其中的自由，当然也是新的、激动人心的政治思考的课题。不管这些对出版社是多么重要，它们都不能成为《轭下的葡萄牙》的新的章节。它们将是另一本不同的书的内容，不过现在要写这样一本书还为时过早。当条件允许的时候，我将乐意为之（为什么不呢），但不是现在。对我们所有的葡萄牙人来说，今天没有多余的时间去进行历史分析，因为大家正在齐心协力、信心百倍地创造历史。

1974年6月10日

于里斯本

政治见习

很难确定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因为学会独立思考需要漫长而艰巨的过程，而左右和制约我们采取立场的决定性影响——表面看起来那怕是纯属个人性质的——又是如此互相冲突。

1942年10月，当我以17岁的年龄进入里斯本文学院的时候，已有了明确的政治思想立场，至少可以说有了主导思想（其后生活道路上的重大抉择和几乎所有重要步骤均从属于这一思想）：那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我“被占领的祖国”的解放事业作出那怕是微薄的贡献。

通过曲折而畅通的渠道，我认识了一些葡萄牙的伟人。在同他们那令人鼓舞的接触中，我不断读书和思考，审视过去并把它同几十年来可悲的、令人羞愧的现实相比较，对同胞们焦虑不安的重大问题时刻寻找明智的立场，渐渐形成了关于祖国、她的命运、前途以及长期困顿的基本观念。这是沉重而又痛苦的观念，正如我同时代的伟大诗人卡洛斯·奥利维拉诗中说的那样：

“祖国的大地啊！您是我们穷苦人的穷母亲！”

我认为，葡萄牙从根本上说，已是一个支离破碎、备受屈辱的国家，一个有待复苏的国家。用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的话说，

“被内部敌人占领的葡萄牙行将变为石头般冰冷的国家”，一个象 17 世纪和 18 世纪时的那种“僵尸王国”，因为当时她陷入了集权主义和宗教裁判的可悲境地，尽管是另外一种类型。国家生机勃勃的创造力被肆意阉割。必须重新执行 1926 年中断的共和制路线，根据时间、地点、发展、进步的需要，以现代构架重新考虑葡萄牙的问题。赫尔库兰诺、奥利维拉·马尔丁斯、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等杰出人物已提出了这种思想。面对整个伊比利亚和欧洲，必须重新思考葡萄牙的问题，彻底变革社会经济结构，提高人的政治素质，因为他们缺乏经验，思想混乱。

1942 年当我进入文学院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发展成一场人类巨大而决定性的冲突——虽然还远未达到决战阶段。

我们绝大多数的年青人，象务实的国民一样，认同盟国的事业，其狂热程度同后来被称之为“合作性中立”的“新政”倾向轴心国列强的程度是一样的。

摆在我们这代人面前的政治和道义上的选择要比目前我们那些彷徨和不满足的孩子们面临的抉择容易得多。战争和迫在眉睫的战斗迫使人们迅速采取明确的立场，从善或是从恶，二者不容混淆。选择是容易的！

当时，我认为自己是反法西斯的。如果问我是什么人或想成为什么人，我就象一部激动人心的战斗影片中的人物那样，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反法西斯战士！萨拉查的葡萄牙政权是纳粹法西斯在葡萄牙的翻版，只不过更圆滑、更虚伪罢了。它实行集权主义，仇视民主与自由，蔑视人在全能的政权（其实是个人专断）面前的各种权利，采用外国的礼仪和徽记——欢呼形式、歌曲、阅兵、“自发游行”等等。

由于共和——自由的家庭教育，我同萨拉查政权的格格不入可以说是与生俱来、刻骨铭心的。

我的母亲是位识字不多,但思想却十分开明的女人,一生都积极赞助我那为政治奔波辛劳的父亲。她的为人和不信神的特性,使她具有一种强烈的反宗教思想——这在当时是十分重要的!

我父亲尽管受的是天主教教育,但从君主制时代起,就一直过着充满变故、冒险,几乎是职业密谋家的生活。他参加过反对若昂·佛兰戈独裁政权的斗争(为此被软禁在维拉·维索萨),积极参与过推翻君主制的密谋——这些密谋引发了1908年1月28日和1910年10月5日的运动。在第一共和时期(1910—1926),他担任过官职:议员和行政长官。1919年,蒙桑托君主复辟阴谋失败后,在多米戈斯·佩雷拉政府中任殖民部长。他曾手执武器反对毕门达·卡斯特洛(1915年5月14日)和希托尼奥·帕伊斯(1918年)的独裁政权,所以1926年5月28日后,他很自然地站到了军事独裁政权的对立面。

反对1926年5月28日建立的独裁政权,就其规模和激烈程度而言,与人们意料的恰恰相反,至少到西班牙内战开始时是这样。共和国境内的政党(非法的)、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的围绕在C·G·T^①周围的工人运动、具有共和传统的陆军和海军的要害部门、共济会、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新天地杂志”派),以及知识青年构成了反独裁斗争的主力军。当时,斗争采取了突出的革命和暴力形式。不断的军事暴动、罢工、流血起义、破坏活动是葡萄牙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时期的特征。政府的镇压也是无情的,其强硬程度和希腊校官运动在对抗中使用的暴力手段可以相提并论。逮捕,不经审讯、没有任何罪名就流放到安卡拉

① C·G·T CONFEDERAÇÃO GERAL DOS TRABALHADORES, 劳动者总联合会,简称总劳联。

埃罗伊斯莫、圣多美、帝汶、塔拉法尔、佛得角等地的集中营，大批撤职，各种类型的迫害，审讯中司空见惯的肉刑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成千上万个家庭深受其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军事独裁政权从政治、经济，甚至肉体上消灭了第一共和时期最杰出的政治人物、工人运动的骨干和知识界最有影响的分子。

1926年5月28日之后不久，我父亲即被解除了在最高财经委员会的职务。他由于参加1927年2月3日到7日的军事起义而被捕，随后又被解除了陆军子弟学校教官的职务（该学校是在他的帮助下创建的）。自1926年到1935年底从最后流放地安卡拉·埃罗伊斯莫的圣若昂·巴底斯塔城堡回来这段时期，他一直是在监狱、流亡（西班牙）和躲躲藏藏中度过的。他积极参与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革命活动，特别是1931年8月26日的革命。乌特拉·马萨多上校和他是这次斗争的主要组织者。

还记得我5、6岁的时候，母亲牵着我的手到阿尔茹贝政治犯监狱探望父亲的情景（后来我对这座监狱十分熟悉，因为1948年我同他一起被关在这座监狱的同一个牢房里）。我也去过圣茹利昂·巴拉古堡。记得在一个寒冷的上午，我到贝尼塞向父亲告别，当时他是第二次被流放到亚速尔群岛。母亲和我怀着无助和愤懑的心情望着渐渐远去的轮船，心都要碎了。地下活动时期，为了偶尔见他一面，母亲常常让我们出奇不意地乘上伪装的汽车，然后多次换乘出租车，兜很多圈子，以便摆脱暗探的监视。我们在罗桑以及后来在列维莱斯的朋友贡德恩特·里贝洛的庄园里度假时，逃亡中的父亲曾以非洲学者的身份化名阿拉乌佐到那里和我们相会过。

童年的往事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经过圣·可拉拉特别军事法庭判决后，父亲从亚速尔群岛回到大陆，不久就创办了一所中学（直到1970年去世时，他一直

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在母亲的大力支持下,他力图重建家中已经完全破碎的经济生活。后来,他长期重病缠身(其间失去了左腿),直到60岁时才不得不安静下来,专心致志地照管自己的学生和学校。在1936年到1945年这段相对平静的年代里,我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父亲的朋友大多来自政治世家,1926年后全被无情地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共和民主派”。他们习惯在星期天下午聚到一起“聊天”。经常有人和我们一起进晚餐,然后就通宵达旦地进行没完没了的争论。谈话总是围绕着当天发生的各种事件,对世界的进展、希望与痛苦(就葡萄牙而言,痛苦总是多于希望)进行绘声绘色的评论。父亲有把日常事件同自己那充满经验与冒险生活中的大事相联系的特殊才能。朋友们向他描述头面人物的特征,详细解释某些事件的细节,谈自己的见解,讲当天的笑话或我们生活中大量存在的丑闻和荒唐事。这些人中有父亲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多次任部长要职的多明戈斯·佩雷拉,前部长,至死不悔的密谋家、在西班牙内战中差一点被枪毙,只是因为奇迹才保住性命的共和派战士乌特拉·马萨多,从西班牙战火中死里逃生的塞沙尔·阿尔梅达(贾伊梅·科特桑和贾伊梅·莫拉斯的战友),从巴黎长期流亡后归来的贾辛托·西蒙斯,平民教育论的忠实信徒、“新天地杂志”派的埃米利奥·科斯塔,前外交部长、爱讲笑话的萨维埃尔·席尔瓦,平民革命家曼奴艾尔·迪亚斯·费雷拉和阿麦利戈·奥利维拉(罗东达广场和10月5号大街集会中的英雄),等等。

这些谈话自然而然成了我的第一所“政治学校”,它培养了我对公众事业的热心、批判精神、独立思考能力和英雄主义。

我感到西班牙战斗已成了笼罩我家、我的父母以及他们朋友头上的灾难,尽管我当时还不完全了解它的深刻含义——只

是很久之后，我才懂得了它的全部可怕的影响。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马德里电台那充满英雄气概和焦虑的呼吁，以及对伟大的传奇式的人物阿萨尼亚、英达列西奥·布里埃托、奈格林、米亚哈、“热情之花”^①、拉尔戈·卡巴耶罗的热情和崇敬，和对另一阵营的一个名叫盖伊霍·亚诺的人在塞维亚电台话筒前的胡说八道的蔑视！

在我12岁到15岁这段期间，明显感到有两种对立的势力在困扰我：官方亲佛朗哥的宣传鼓噪在报刊上达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健忘的“葡萄牙俱乐部电台”不断播放刺耳的军号声（在葡萄牙俱乐部电台的活动中，应该提到1974年4月25日凌晨它那历史性的广播以及从那时开始，它的播音员和技术人员所做的一切有益的工作）。在学校里，同学们都是官方有组织的反赤色宣传的受害者，沉闷得象一潭死水。这和我家那种高昂的、拥护共和的神秘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班牙内战和葡萄牙的大规模镇压简直是并行不悖！

正是这个时候（我想是1936年到1937年我上中学三年级时），我被迫参加了刚刚成立的“葡萄牙青年”组织。但是对我来说，“葡萄牙青年”就象洒在玻璃窗上的一阵细雨，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从未穿过“绿制服”，也没有行过可恶的法西斯举手礼。虽然名义上担任过“伍长”，但从未佩戴过有“S”字样的臭名昭彰的武装带（S是“值勤”呢？还是萨拉查的标记呢？）^②，更没有参加过他们组织的任何游行、示威或集会。我从未喊过“谁统帅我们？”然后又平伸手臂齐声回答“萨拉查！萨拉查！萨拉查！”这实在是万幸！

① “热情之花”(LA PASSIONARIA)，指当时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伊巴露丽。

② 葡文中“值勤”(SERVIÇO)和萨拉查(SALAZAR)均以S字母开头。

在中学将要毕业时(1941—1942),我结识了三个人,他们给我的深刻影响使我更加左倾,反法西斯意识更加明朗。他们是:阿尔瓦洛·沙列马,我的哲学老师,异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他正在潜心研究尼采和弗洛伊德,具有塞尔吉奥的批判精神(他自称是塞尔吉奥的学生),在我们这些少年人的眼中,亚速尔的长期监禁使他身上罩上了一层浪漫的光环;阿尔瓦洛·库尼亚尔,从各方面看都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目光敏锐,炯炯有神,胆略过人。他刚从狱中出来,教我们地理课,正处于一生中的关键时刻,因为他准备进入地下活动以便重建共产党;阿戈斯迪纽·席尔瓦,我的文学老师,神秘的非宗教主义者,公民英雄主义的信徒,安东尼奥·塞尔吉奥的朋友,当时正在从事文化宣传和同青年精英接触的工作。他办的“传播手册”很出色,从第一期开始我就是它热心的订阅者。后来,由于出版了《基督主义》小册子,阿戈斯迪纽·席尔瓦同极端保守的天主教上层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导致他锒铛入狱,并在获释后不久背井离乡远走巴西。

这三位在思想和气质上迥然不同的人都给予我以深刻的影响。他们虽然表现方式不同,但和现政权都格格不入。同我父亲及其朋友们那些旧式的、和蔼可亲的但过时的“资产阶级反对派”相比,他们的立场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他们也乐意以此来保持和前者的距离)。

在思想上,风格上,甚至在论述国内问题的方式上,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例如,阿尔瓦洛·库尼亚尔和阿戈斯迪纽·席尔瓦两人就截然不同。他们知道我的话只不过是别人思想的笨拙反应,所以常常通过我进行激烈的辩论。尽管两人都醉心于自己的理想,对现行制度全盘否定并致力于变革被法西斯摧残的祖国,但所走的道路却截然不同。

他们三人只有一次发表过相同的意见,那就是打消我一直

想入法律系的念头。法律是上层建筑，它是统治阶级可憎的、看得见的表现形式。我到反动派的城堡中去干什么呢？到七年级时，他们终于把我的志向扭转到了文学系的历史哲学科学方面。后来，我不得不承认，当时的心血来潮除了使我失去十年光阴之外，几乎是毫无裨益……

当时，葡萄牙文学界出现了后来被称之为新现实主义的革新运动。由于在审查方面不断遇到麻烦，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刊物几乎都是短命的：里斯本的《魔鬼》（后期由费尔南多·毕德拉·桑托斯所领导），由一批热血青年所领导的波尔图的《旭日报》，在同代人中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科英布拉的诗选《新诗歌》（卡洛斯·奥利维拉、费尔南多·纳莫拉、马里奥·迪奥尼西奥、曼奴艾尔·丰塞卡、若昂·戈索费尔、若阿根·纳莫拉多等就是由此而出名的作家）。

这场运动力求吸收由“俄耳甫斯”^①和“风采”引入葡萄牙的现代派革命的经验 and 成果，它恢复了战斗文学的传统并继承了1870年那一代作家们改革社会结构的理想，所以它介入社会和政治的特点十分突出。我进入文学院时，阿尔维斯·列托尔的最初几部小说已出版，索埃伊洛·佩雷拉·戈麦斯（多年后成了我亲密的同志）也出版了《河叉》。记得这本书的封面是淡玫瑰色的，附有阿尔瓦洛·库尼亚尔动人的插图。这些插图本身就是奋起的呐喊。

我同新现实主义的第一次接触是在《世纪报》举行的阿曼多·巴塞拉尔的报告会上。被誉为“现实之声”的已故的朗诵家曼奴艾拉·波尔图女士也参加了报告会，并朗诵了费尔南多·佩

① 俄耳甫斯(ORFEU)，希腊神话中的歌手，善弹竖琴，他演奏的音乐可感动鸟兽木石。

索阿的作品。我是由阿尔瓦洛·库尼亚尔带去的，尽管他行动谨慎，但仍不愿意失去发展新党员的机会，因为他知道战斗的文学是政治斗争的前奏。他们一般从阅读列托尔、索埃伊洛或若瑟·亚马多的作品开始，随后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进阿尔茹贝或卡西亚斯监狱进行长期的磨炼！

这年，我曾在若昂·德乌斯博物馆参加过路易·费若的一次报告会。虽然报告会最后以大打出手结束，但我仍感到十分自豪，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不久，我在阿连特茹文学会馆又参加过一次费尔南多·格拉萨讲解的宗教音乐会（格拉萨是我中学时的合唱老师，葡萄牙现代音乐的伟大革新者，一位杰出的人物）。就是这样一场纯文化性的演出，竟然也受到法西斯突击队的干预，因为他们认为音乐会“表现了赤裸裸的颠覆精神”！一位名叫卡洛斯·索维拉尔的纳粹青年指挥了这次行动。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后来在文学院又见过面。几年后，在1962年学潮高涨期间，他当过几天国民教育副国务秘书。

这是我同政治的第一次接触。音乐会中断了，出口处是喊声、嘘叫、拥挤、冲撞，一片混乱。我被抓起来并被送到国家剧院附近的派出所，几小时后经过例行的严重警告并查明在档案中没有前科之后才被放了出来。

我进入文学院的前一年，因“增加学费”而引起的大规模游行使得那一学年成为多事之秋。一方是一小撮维护现行制度和特权阶级的好斗分子——“葡萄牙青年”的骨干——和“天主教青年”中那些赤裸裸的反动分子；另一方是同样激进的少数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力图推动那些“仅仅反法西斯”的青年）。而处在两派之间的广大群众却无动于衷。他们自私、谨小慎微、保守、对政治不感兴趣，除足球之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

学潮期间，由“共产主义青年”所左右的“反对派”控制了广大的中间群众，他们经常组织辩论和抗议活动。不过，这些活动除了起到某种培养骨干的作用之外，达不到任何其他目的。当时，费尔南多·桑托斯在里斯本文学院炙手可热，其影响直到第二年我在文学院时还可以感到。但是“反对派”是由一小批抱得很紧的人组成，他们使用的诡秘语言只有小圈子里的人才懂，而且醉心于神秘的把戏，实际上对青年群众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通过吉列尔麦·科斯塔·卡瓦略，我同这伙人开始建立了联系。当时我在中学七年级，而卡瓦略在里斯本大学科学系就读。我想大概是库斯托迪奥·马托纳多介绍我们认识的。

卡瓦略的一生堪称为理想而无私奉献的楷模。他是富家子弟，整个青年和壮年的大部分时间却是在监狱、集中营和流亡中度过的。当时，他已是一名激进的、忠诚的共产党人。是他第一次不厌其烦地向我批判“自由反对派”并指出它在实践上的缺陷。他忘情地谈起很快就要到来的霞光万道的明天。^①

在这些接触中，我还不能说共产党的宣传对我有多大启示。家父和他的朋友虽然钦佩共产党人的牺牲和实干精神，但对他们采用的方式却持保留态度，从而使我对这种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宣传产生了某种免疫力。

除去意识形态之外，共产党的方法论中还有某种新的、从未在别的地方看到过的东西深深触动了我：那就是行动！我尖锐地感到，必须对现政权进行某种抗争，以便为在全世界进行的反法西斯总斗争作出那怕是微小的贡献。但是怎么作呢？当时大学里唯一有组织的反对派就是共产党的青年组织。这条路尽管错综复杂、有可商榷之处，但它毕竟是一条道路啊！

^① 卡瓦略于1972年以重病之身出狱，不久即去世。

1942年是英勇斗争的一年，苏联以其坚忍不拔和大无畏的精神承受了纳粹进攻的几乎全部重压。英国的战斗虽然同样可歌可泣，但已成为战争中翻过的一页。在俄国广袤的大草原上进行的较量远比在北非炎热的沙漠上的战斗更能决定全世界的命运。对这一点，我们都是很清楚的！

苏德条约的签订，俄国人对芬兰和波兰的入侵，莫斯科的大清洗，发生在我们门口的西班牙内战，都是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但这些一去不复返的事件并未触及到我的内心深处。当进步力量实现伟大的联盟时，人们无不感到由衷的高兴。斯大林成了人们熟悉的留着小胡子的“乔大叔”。^①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反法西斯的、民主和谐的、充满兄弟情谊的世界啊！

这年夏天，我象往常一样在福斯·阿列辽度假，在科斯塔·卡瓦略的介绍下，在那里认识了刚从法律系毕业的翁伯托·洛贝斯和他的朋友勃兰其·特塞拉、若瑟·阿兰蒂斯（他们二人后来以共产党的罪名被捕并在狱中关了很长时间），若昂·安德拉特、马里奥·费雷拉和其他人。翁伯托·洛贝斯已同共产党的领导人彼得罗·苏亚雷斯的妹妹结婚。

这个“假期苏维埃”小组对我一、二年后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起了很大作用。当时，我是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大概相差7—8岁的样子），所以既是小弟弟，又是徒弟，尽管我没有正式加入该组织。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在那些亲切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是多么振奋。我感到自己已成为这个小组的一名成员，认为它是长长的、秘密链条中的一环，能给葡萄牙一个新的面貌！

我从来不是一个天主教徒，没感到过“神”的召唤，所以不明

① 乔大叔(uncle Joe)，乔是JOSEPH(约瑟夫)的昵称。

白在参加某些神秘团体的人身上，这种感情为何那么强烈。但从内心看，我当时并不想和自己的“新身份”相去太远。

俄国的战斗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我们在临时弄来的地图上激动地注视着军事行动的进展，尽情嘲笑充斥在《新闻日报》上的为希特勒助威的预言。帝国时期风云一时的瓦斯科·卡瓦略准将为了讨好德国人的朋友，竟然放肆地写道：“从军事上讲，俄国已被消灭了！”世上的事真是无奇不有。多年后，这个瓦斯科·卡瓦略竟和我父亲以及其他老共和分子一起坐在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罪名是参加了所谓的“1947年4月10日反萨拉查的革命阴谋”！

那里的小学教师有一架当地唯一的收音机。晚上，我们摸黑到学校里去偷听BBC的广播。当时，偷听BBC广播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罪行，要冒很大的危险……如果要说是罪行的话，那么整个葡萄牙都犯了罪！

这所学校是由铁杆共和派戈兰德拉创建的，课堂里有一块很大的瓷砖壁，上面绘着几位共和时期的大人物的像。西班牙内战期间，画壁被当地的法西斯分子捣毁了，因为他们不能容忍“这种胆大妄为的东西继续扰乱无辜的孩子们”！老师经常指着墙壁让我们看“战争失败”所留下的可耻标记……

福斯·阿列辽的海滩宁静宜人，为数不多的度假者大都互相认识。

1942年假期结束后，我口袋里揣着若泽·勃杰斯·马塞多的一封信回到里斯本准备进入文学院（生活兜了许多圈子，他今天成了文学院的教授）。他当时是里斯本大学的头号活跃分子，后来又促使我参加了反法西斯的学生斗争。

我踏上了生活的征程！

· 2 · 在文学院

文学院在科学院最低处的一所破旧的修道院内，它不佳的名声从罗德里格·拉巴教授的口头禅中可见一斑：“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下着进去的学校！”

到文学院需从科学院的旧门进去，下一段长长的走廊式的阶梯，来到昏暗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庭院。那里有 5、6 间教室，这就是文学院。一所学校的设备——包括使用的教材——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但却是很重要的。教师队伍的“精神”和素质更是非同寻常。几年前，文学院虽然也在这个不敢恭维的地方，但却是个颇有声望的学府，有引以自豪的正式任命的教授，如特奥菲洛·布拉加、阿道夫·科埃辽、列伊特·瓦斯康塞洛、法利亚·瓦斯康塞洛、大卫·洛贝斯等。

文学院的全面没落是和 30 年代整个葡萄牙各大学的情况相一致的，是法西斯主义上升和巩固、政治清洗、教师和学生的自由受到重重限制的结果。在文学院，罗德里格斯·拉巴、赫尔南尼·希达德和牛顿·马塞多先后被解职。而对教师打击更大的是，在聘任新教师时，完全不以业务能力和学术成就为条件，而是以对当局的政治忠诚和对骨干教授的屈从程度为标准。

如果要对萨拉查政权进行什么严厉的指控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它多年来在大学（当然不仅仅是大学）疯狂地、不断地实行